

人與制度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Institutions

——和諧元錄 (下)

The Primary Ideas On Harmony

蘇東斌

澳門理工學院
2006

F014.7
20082
2

人與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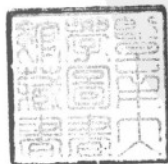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Institutions

——和諧元錄

The Primary Ideas On Harmony

蘇東斌 編撰

(下)



澳門理工學院
2006

人與制度——和諧元錄（下）

作 者：蘇東斌

出 版：澳門理工學院

封面設計：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年7月

版 次：初版一刷

印 數：1200套

定 價：澳門幣260圓/一套

I S B N 99937-58-21-3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學術顧問：李向玉教授

徐雅民教授

Academic Advisers: Prof. Li Xiangyu

Prof. Xu Yamin

題辭一

不瞭解60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人，就不能確信到鄧小平所創造的改革開放總政策的偉大；

不掌握3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史的人，就不能體會出胡錦濤所倡導的新發展觀念的正確。

Those who do not know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ver the past 60 years certainly do not realize the greatness of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ies put forward by Deng Xiaoping;

Those who do not know the experiences of China's reform over the past 30 years certainly do not realize the correctness of the concept of new development put forward by Hu Jintao.

題辭二

若說沒奇緣，毋庸置疑，沒有毛澤東，便沒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若說有奇緣，可以斷言，在一九七六年之後，即使是面對鄧小平，中國人民也不會再“三呼萬歲”了。

我以為，這就是“人與制度”的總關係。

If you do not believe in destiny, undoubtedly, without Mao Zedong,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f you believe in destiny, we can allege for sure, even facing Deng Xiaoping after 1976, the Chinese people would have never chanted “Long Live Deng!”

I think it is the gen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institutions.”

鳴謝

我在澳門理工學院作訪問教授的兩年中，本書的學術顧問李向玉教授給予我最為重要的東西，就是提供了一個“和諧”的環境。

他向我提出了一個相當尖銳的課題：當澳門的博彩業稅收2005年已達173.19億元，占全年財政收入的76.06%的時候，這種狀態是否意味著經濟社會的不“和諧”？！他希望我把眼界再放寬、靜坐下來，研究一番。於是，也便有了這本書。

本書的另外一位學術顧問北京大學的徐雅民教授，他是我的老師。當他完全曉得我的創作意圖後，便提醒我要做全方位的考量。他對於史料運用的細心與藝術，有時使我感到驚訝。

我的同事伍鳳蘭女士（她是我的碩士研究生，現在攻讀武漢大學博士學位），對本書作了通篇校對和耐心整理。否則，這本書就象在舊倉庫裏堆放的一批零部件。

我的同事鍾若愚副教授（他也是我的碩士研究生，現正攻讀南開大學博士學位），對本書進行了技術上的處理。否則，這本書將使人們讀來極不愉快。

特別要感謝的是陳勇博士、副教授。他用優美典雅的文筆翻譯了序言和目錄，極大地增添了本書的讀者群與深厚感。

不言而喻，沒有家人的支持，不僅會沒有創作的時間，更會失去創作的靈感。

對於本書所引證的大量史料與論述，使我必須向所有的原作者及報刊、雜誌、出版社致敬，因為幾經轉載，資料來源難以一一列出，只好向原作者、原雜誌道歉請諒。只是有了這些資料，才能閃爍出本書的靈魂來。

Acknowledgements

Over the past 2 years when I was the visiting professor with Macau Polytechnic, the academic adviser, Prof. Li Xiangyu, provided me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an harmonious" environment.

He asked me a very acute question: when the lottery tax in Macau was RMB17.319 billion in 2005 which was 76.06% of the revenues for the total year, was this a sign of disharmony in social and economic respects? He expected me to broaden the vision, settle down and do more research. Here the book comes.

The other academic adviser, Prof. Xu Yami with Beijing University, was my teacher. When he completely understood my intentions of writing this book, he kept reminding me of the importance of comprehensive thinking.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carefulness and the art of how he dealt with historic materials.

My colleague, Ms Wu Fenglan (my former M.A. student, now PhD candidate in Wuhan University) collated the whole book. The book would have been just like the spare parts in the warehouse without her help.

My colleague, associate professor Zhong Ruoyu (he was also my former M.A. student, now PhD candidate in Nankai University) provided technical support to the book. Otherwise reading the book would be unpleasant.

I appreciate Dr. Chen Yong for his elegant translati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orward and contents may allow more readers to be interested in this book.

I sincerely thank the authors,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from which I cited a lot of historic materials and statements. Because the reference materials have been quoted many times, I cannot list all the origins of the materials. I am sorry about this. The soul of the book is displayed with the help of those materials.



又綠春風

（序言）

到後來，人們才慢慢明白，為什麼海德格爾的老師胡塞爾當初的一句口號，會引起西方學界持續多年的震撼？！這句口號就是要“直面於事情本身”。因為他主張：要跳出邏輯，力求把握“邏輯背後”的真正本源。正是有感於“客觀的科學的世界之知識，乃是以生活世界的自明性‘為根基的’”，一旦面臨這個一切科學、一切理論、一切人以及一切人類社會都“從屬於之”的“生活世界”，“我們就會突然意識到，……迄今為止我們的全部哲學工作一直都是無根的”。對此，維特根斯坦說得更直接：“不要想，而要看！”^①。

再細看，中國的孔子早就說過，子絕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見《論語·子罕篇》，即有四件事要牢記：不要優先佔有的觀念；不要有限定的必然；不要固執己見；不要一個特殊的我。

當代劉再複先生近年也反復強調的一個命題：生命話語，大於歷史的與倫理的話語。它便再一次體證了蘇煒先生多年前在文學上的一點領悟：在文學書寫中，“越主觀的，便是越客觀的”，“越常態的，便是越永恆的”。同理他警告人們在認識生活、審視社會的廣大言說背景之下，越是背離常識事理，遠離經驗真實，遠離“生活世界的自明性”的那些“永遠正確”的觀念條條，反而越是需要引起人們警惕的。^②

然而，即使是“眼見為實”，做起來也還不是那麼簡單。例如，67歲的法國作家紀德在1936年曾歷時兩個月訪問蘇聯，在三個月後又寫出震驚世界的《訪蘇聯歸來》中出現了這樣一句話：“蘇俄是普及謊言的，在那裏，甚至連眼睛都可能受騙。”^③

^① 參見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與先驗現象》、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轉引自甘陽《從“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見《讀書》1987年第7期。

^② 資料引自蘇煒：《歷史的肉身》，《讀書》，2004年第2期。

^③ 資料均引自王森：《“紀德看到了什麼”》，《書屋》，2006年第5期。

據介紹，作為一名作家，紀德在蘇聯所受禮遇之隆，是他本人也萬萬沒有想到的。他享受到了只有國家元首才能夠享受的待遇。從紀德踏上蘇聯國土的那一天起，他就非常驚詫地發現，自己已經處於鮮花與掌聲的包圍之中了。他的足跡所到之處，一定會有盛大的歡迎儀式，隨之而來的即是地方行政官員全程陪同的參觀和遊覽。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個村莊，只要是紀德經過的地方，到處都懸掛著五顏六色的彩旗，上面寫著“歡迎安德列·紀德，法國最偉大的作家！”更讓紀德感到不可思議的是，當他走進一個劇場時，正在演出的戲劇竟然也會馬上中止，全體觀眾起立，在法國國歌《馬賽曲》的伴奏下向紀德致意。值得一提的是，紀德還很榮幸地被邀請參加了高爾基的葬禮。他不但走上了設在紅場的高爾基追悼會的主席臺，與史達林、莫洛托夫、米高揚等蘇聯領袖們站在一起，甚至還親自為高爾基致了悼詞。當紀德站在紅場高處，凝望著如此壯觀的場面，凝望著下面川流不息的人群時，他既為蘇聯感到驕傲，同時，也感受到了一種在任何別的地方從來沒有感受過的人情味。他覺得那是同志加兄弟的真正情誼。他說：“我們的思想中是把文化的命運和蘇聯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我們要捍衛蘇聯。”“為了它，我可以放棄世界上最美好的景致。”

至少從表面看來，蘇聯的一切都顯得那麼井井有條、那麼高尚、那麼完美，但是，隨著遊覽的不斷深入，紀德仍然憑著自己的直覺感到了其中的虛假。很顯然，他們每天的日程都是策劃好的，見什麼人，不見什麼人，該看什麼，不該看什麼，也明顯經過了一番精心的安排。在紀德眼中，這裏的社會雖然看起來的確像一個人類的樂園，但人們的所作所為卻總是帶有一種表演的痕跡。而且，隨著時間流逝，這樣的蛛絲馬跡也開始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這讓紀德感到了深深的不安。終於，紀德尋找到一個可以打破官方安排的機會。那是從莫斯科到奧爾忠尼啟則去的列車上，紀德一行本來有自己的包廂，但他們卻通過與列車員的交涉，與另外車廂中的一群到高加索去度假的共青團員交上了朋友。在與他們無拘無束的交談中，紀德既被這些年輕人的熱烈情緒所感染，同時，也深為他們對外面世界的無知，以及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而感到驚訝。如果說這次偶然的相遇還讓紀德對自己的所見所聞充滿了疑惑，那麼，紀德以後的經歷則讓他完全證實了自己的判斷。

有一次，當紀德詢問一位大學生的外語成績如何時，他竟然聽到了這樣的回答：“幾年以前，德國和美國還有東西可以讓我們學學。但是，現在，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向外國學習的了。因此又何必去講他們的語言呢？”對此，紀德在自己的遊記中作了如是評價：蘇聯公民對外國的無知非同一般。更有甚者，蘇聯公民被告知國外各方面一切都不如蘇聯。他們巧妙地讓蘇聯人保持了這種幻覺。因為重要的是讓每個人慶倖自己處於讓他免遭更不幸的

痛苦的政權之下，即使這個人並不很滿意。我想，也正如當年封閉中的中國曾高歌“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一樣，一旦國門大開，國人就突然發現，那三分之二受苦人首先正是我們自己。多麼的可悲、多麼的荒唐。也正是基於這種見聞，紀德認為，由於阻止了和外界的聯繫，蘇聯人的幸福實際上是建立在期望、信任和無知之上的。於是，紀德進而得出這樣的結論：“這種文化完全朝著同一方向，無公允可言，涉及各個方面，幾乎沒有批評精神。”

應該承認，紀德的眼光是非常銳利的。雖然紀德在蘇聯只有短短兩個月的時間，面對的是一個經過了層層美化之後的現實，但他還是通過自己的觀察與分析，看到了蘇聯政治隱秘的另一面。而他遊記的筆觸也同樣涉及蘇聯社會的各個層面。在莫斯科，紀德這樣記錄了自己的觀感：“在任何地方都不會像在莫斯科的街上讓人如此感到社會平均化的結果：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每個人的需要似乎都是一樣的。……人人都異乎尋常地穿得一樣。如果能夠看到人們的思想的話，無疑地這種千篇一律也一定反映在人們的頭腦裏。也正因為這種一致，每個人能夠快樂，並且表現出快樂的樣子。”

同樣是出於絕對平均化的結果，蘇聯人對於商品的需要也顯得不是為了滿足個人的喜愛，而只是為了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因而，“那些商品幾乎都不堪入目，簡直讓人以為這些商品是盡可能為了倒人胃口而製作的”。蘇聯人的住宅也好不到哪里去，裏面除了千篇一律難看的傢俱和同一張史達林像外，其他幾乎一無所有，“沒有一點點個人的東西，沒有一點點私人紀念品”，以致“每一住所都是一模一樣，完全可以互換，連集體農莊的莊員們也是一模一樣，可以調換，如果他們互相換一下位置也不會被人察覺的”。

當然，令紀德感到震驚的遠遠不止這些，在他看來，最不可思議的個人崇拜在蘇聯人眼中竟然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紀德所到之處，無論是公共場合還是私人住宅，“到處都懸掛著史達林的頭像，人人嘴上都掛著他的名字，每一個的講話中都無可遺漏地頌揚他”。在史達林的故鄉戈裏，紀德曾經有過一次這樣的經歷。他出於禮貌發一份電報給史達林，對自己在蘇聯受到的接待表示感謝，只是因為電文中沒有加上“您，勞動人民的領袖”，或者“各族人民的導師”的字樣，營業員竟然拒絕拍發。直到紀德妥協之後，電報才如願發出。這些記述很容易讓人想起“反烏托邦三部曲”中的類似情節。但紀德的文字不是想像力的產物，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雖然他的確無心諷刺，但他的文字卻具有更加深刻的諷刺力量。

如果說上述記錄觸及的仍然只是蘇聯人的日常生活表像的話，那麼，無疑紀德已經開始透過這些表像，逐漸觸摸到蘇聯政治的實質。通過與蘇聯文化界與藝術界人士的接觸與交流，紀德發現，“在蘇聯，不管一部作品多

麼美，只要它不緊跟路線，它就會遭到羞辱。美被看作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價值”。一旦有人不同意使自己的藝術墮落，並拒絕俯首聽命，官方就會迫使他們保持沉默。而一直就被蘇聯官方所竭力吹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其實質也不過是相互揭發與相互指責，“線上內可以任意批評，出線的批評是不允許的”，“誰企圖走得遠一點誰就會遭殃”，“眾人的幸福是以每個人的非個性化取得的，眾人幸福是以犧牲個人而得到的。為了得到幸福，就得聽話，隨大流”。於是，在蘇聯文化界，你根本聽不到任何不同於主流觀念的聲音，藝術家的思想已經被消磨得沒有棱角，奴性與虛偽竟然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之常態，同時也是他們的個人利祿之所系，因為他們只有聽話，才能有所收益，只有“思想對路”，才會進入日益膨脹的特權階層，乃至最終從平均主義的樊籠中脫穎而出，成為國家的新貴。

對於紀德而言，他在蘇聯的所見所聞，與他當初的理想大相徑庭。

知識份子的良心驅使他終於認識到：“俄羅斯不是一個提出訴訟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亞的確是個流放的地方。”他說：“在今天的蘇聯，人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不幸，比任何國家都更加缺乏自由。”面對著後來世人的責難與圍剿，這，就是紀德的回答。^①

所以，觀察、思考、再觀察，再思考，才能逐步接近生活的真相。

一九四二年吳祖光先生寫出了《風雪夜歸人》。乍一看，似乎有些“脫離時代”：寫的是一個典型的“與抗戰無關”的故事，一段京劇名旦與官僚姨太太的情史。但吳祖光先生卻在劇本一開始，就提出了“戲演的是什麼時代”的問題，可見時代仍是他關注的中心；而他的回答是：“那是高貴蒙受著恥辱的時代，黃金埋沒在泥沙裏的時代。”當吳祖光先生說明自己的創作追求時，劈頭就提出：“我為什麼著作？”並且強調：“每一部文藝作品所表現的都是作者自己”，我“自己就隱藏在這（劇本）每一角落裏”（《記〈風雪夜歸人〉》）。這幾乎可以看作是吳祖光先生的創作宣言。而他在回答“我為什麼著作”時，又引述房龍的話：“主要是我憎惡浪費與無用的暴力，這兩種壞脾氣都是由於愚昧生來的。”這就決定了吳祖光先生所要發出的聲音是對充滿浪費（首先是生命的浪費）、無用的暴力與愚昧的時代的批判；這自然是一個由早期創作的歌頌向批判的轉變，從此，批判成了吳祖光先生對時代的主要承擔方式。或許可以說，從《風雪夜歸人》開始，中國現代戲劇史上，以及中國知識份子精神史上的“吳祖光”，才以鮮明的“這一個”的姿態出現了。^②

^① 資料引自：[法]安德列·紀德著，朱靜、黃葆譯：《訪蘇聯歸來》，花城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② 錢理群：《獨憐風雪夜歸人》，見《讀書》2003年第9期。

據記載，“沒有任何事像醫生事件給我這麼深的印象，”1953年4月11日，史達林死後一個月，溫斯頓·邱吉爾寫信給艾森豪總統說：“這件事必定深深地侵犯了共產黨的紀律和組織。”^①邱吉爾憑直覺認識到，這個“事件”對於蘇聯和世界事務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雖然很難說出到底是什麼樣的重要意義，他還是教促美國總統將這看作未來美蘇關係中潛在變化的跡象。

像邱吉爾預見的那樣，“醫生事件”是一個糾結的、複雜的事件，深深地嵌在克里姆林宮的領導機構之中。它既反映了史達林對外政策的許多意向，也反映了他的政府內部的緊張關係。如果這個針對猶太醫生的陰謀得逞的話，那之後的世界歷史的很大一部分也許要改寫；克里姆林宮的許多上層人物也許已被洗清，甚至被處決；安全機構和軍隊可能已在清洗中被大批毀壞；蘇聯的知識份子、藝術家，特別是猶太人可能已被殘酷地鎮壓；蘇聯和東歐的猶太人當中的這些倖存者也許受到了嚴重的（甚至致命的）危害；而全蘇聯的公民可能已經遭受了難以忍受的苦難。當史達林在1953年3月5日突然死亡時，像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末的恐怖那樣的、另一場更大的恐怖便被防止了。“最後解決”的藍圖未能實現，新上任的蘇聯領導們立刻將蘇聯社會從它正要邁向的深淵拉了回來。失去“做人的尊嚴”的豈止是醫生們，這個處於極度的不信任和國家暴力的持續威脅之中的社會，到了文明能夠忍受的極限，它破壞了全體人民的“做人的尊嚴”，構成了對全球文明的威脅。^②

其實，離開每個公民的自由和權利，人民利益便成了子虛烏有而又令人恐懼的“良心強迫”的怪物。如俄國思想家赫爾岑所指出的那樣，所謂“人民利益原則從來就是個‘罪惡’原則，是最大的暴虐；接受這原則，就是將個人自由犧牲於某種巨大抽象物，就是接受暴政，因為它總是走上一條最終必然導致‘吃人’的道路——這就是為所謂的‘未來幸福’而屠殺今日之生靈。”17年前紀念五四的時候，甘陽在《讀書》上發表了《自由的理念：五四傳統之闕失面》，他認為“近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的最大教訓或許就在於：他們總是時時、處處把社會、民族、人民、國家放在第一位，卻從未甚至也不敢理直氣壯地把‘個人自由’作為第一原則提出，因為在他們看來，個人自由似乎只是關乎一己之私事。”他進而指出：“近代中國知識份子也一直沒有弄明白，所謂以‘個人自由’為第一原則，並不是說要將它作為社

① 邱吉爾給艾森豪的信，1953年4月11日。引自克勞斯·拉雷斯，《邱吉爾的冷戰：個人外交政治》（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2002），210。

② 參見[美]喬·布倫特、[俄]弗·諾莫夫：《史達林晚年的離奇事件》，新華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會人類的最高原則，而恰恰是說它是最低原則，亦即最起碼的要求，最基本的條件。保證了‘個人自由’，並不就保證有了一切，但是，剝奪了‘個人自由’，則最終必然會毀滅一切。”20世紀的歷史中，知識份子在民族國家、人民利益等宏大辭彙的感召下，自覺地將個人利益放置在從屬於國家利益的地位，也容忍了國家對某些正義的戕害，他們自以為這是高尚的有價值的犧牲和寬容，殊不知這恰恰是迫害了自由，也縱容了政府的惡（須知好的政府是要公民去“馴化”的），最終人民連同知識份子都成了無謂的犧牲品。

1959年3月，晚年胡適在《自由中國》發表了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容忍與自由》，在這篇文章裏他提出了一個著名觀點：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結合自己早年的經歷與歷史上的宗教迫害，認為“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他用感恩的心情說道：“我要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因為我年紀越大，我越覺得容忍的重要意義。若社會沒有這點容忍的氣度，我決不能享受四十年大膽懷疑的自由，公開主張無神論的自由了。”^①

學者們注意到，有趣的是，在自由主義思想家看來是法西斯思想先驅的黑格爾，卻並沒被納粹思想家當做自己人。黑格爾主張作為理性整體的法治國家，要求不加區分地保護每個人的利益，這種政治理想與納粹國家的現實相去何止萬里，納粹以黨治國，而黑格爾認為國家高於一切個人和集團的利益之上。這樣，黑格爾自然成了納粹的異端。他們以為可以像消滅一個人的肉體那樣消滅黑格爾的思想。就在希特勒上臺的那一天，卡爾·施密特躊躇滿志地說：“可以這麼說，黑格爾死了。”但歷史卻證明黑格爾並不那麼容易死去。

黑格爾是第一個從世界歷史的高度對現代性進行全面反思與批判的思想家，在此意義上，馬克斯·韋伯，乃至尼采和海德格爾，都是他的後來者，他既是現代的產兒，又是它的逆子；既是現代的辯護士，又是它的批判者。他的思想充分體現了現代本身的異質性和曖昧。現代的矛盾也體現為這位辯證法大師思想的矛盾。在黑格爾看來，現代的根本特徵是個人從種種束縛下解放出來，市民社會就是這種個人自由或自由個人在制度和政治上的體現。

黑格爾對市民社會有定義是：“這是各個成員作為獨立的單個人的聯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聯合，這種聯合是通過成員的需要，通過保障人身和財產的法律制度，通過維護他們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來的。”^②黑格爾講的市民社會，其實就是現代資產階級國家。

^① 資料引自轉唐小兵：“容忍與自由”見《隨筆》2006年第2期。

^② 黑格爾：《法哲學》第157節

與同時代的浪漫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不同，也與當代的現代性批判者不同，黑格爾首先是現代社會合法性的有力辯護者。雖然市民社會是一個惟利是圖的社會，但它卻是一個從未有過的自由社會。它堅持個人不可讓渡的平等權利，增加了人的需要和滿足它們的手段，組織了勞動分工，推動了法治。黑格爾與自由主義者一樣，認為私有財產是自由的首要體現，取消私有財產等於取消自由個人。國家必須保護和滿足個人利益，決不能建立在取消個人權利的原則基礎上。自由作為他哲學的最高原則，不僅具有政治和道德的意義，更有形而上的意義。

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的《法哲學》時曾說過，理論要有說服力的話，就要徹底。“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要瞭解人類中心論的現代社會，必須從它對人的理解著手。原子式孤立的個人既是現代性對人的基本描述，也是它自我理解和構建的主要意識形態假設，是一切現代價值系統的基石。自由歸根到底是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而權力則最終是佔有和維護自我利益的權利。個人（自我）是社會的基本出發點和前提，而非相反。正如黑格爾所指出的：“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①因此，虛無主義是現代的宿命。

黑格爾認為只有國家才能做到這一點，只有國家才能建立理性的自由。但黑格爾所講的“國家”不是作為一種暴力機構和行政管理機構的現代國家政權或國家機器，而是指作為人們共同生活基礎的倫理與文化共同體，當然，它也是一個主權政治實體。國家的本質不在其外在的權力——暴力特徵，而在其內在的理性性質。國家是保證個人與社會充分發展的結構，黑格爾將它稱為“國家的合乎理性的建築結構”。國家體現了理性的秩序與自由。它不是要取代市民生活，而是要保護它的利益。它是個別與普遍的完美統一。如果說，在市民社會中人們是基於各自理性自由地決定聯合在一起。在國家，“個人的單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僅獲得它們的完全發展，它的權利得到明白承認”^②。為此，黑格爾寄希望於國家這個倫理生活的共同體，以為它能讓自由和權利在一個普遍理性的框架中得到實現。事實證明這和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樣，只能是一個烏托邦。

漢娜·阿倫特曾極為深刻地指出，現代的政治特徵就是私人利益變成公共事務，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是共同意志之體現的公共領域日益萎縮；另一方面是國家（政府）“淪為一種更加有限、更加非個人化的行政區域”。“政府的職能是向私有者提供保護，使他們不致在為取得更多財

① 黑格爾：《法哲學》第182節。

② 黑格爾：《法哲學》第260節。

富而展開的競爭中互相侵害……人們所共有的惟一的東西是他們的私人利益。”^①在私人利益高於一切，並成為社會基本原則的現代，國家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的“公器”，或共同利益的代表與維護者，它不可避免程度不同地為強勢集團所支配。即使當國家以人民和全體利益的名義剝奪個人自由與權利時，仍然是如此。可以說，黑格爾心目中的國家，根本不可能存在。^②

學者們對於社會的和諧曾做了比較性的總結：以史為鑒。毛澤東時代的經驗教訓擇其要不外兩點。第一，一個人民主權的國家是國民經濟健康運行的首要條件。這個國家的目標是民族的發展和全體國民的福利，它必須有能力、財力和號召力來支援這些目標。第二，健全有效的法制和民眾參與、監督機構是人民主權的制度保障。否則一旦人民意志架空，公眾意願即被壓制或誤導，甚至使以“人民”的名義迫害無辜、侵犯人權成為可能。一方面，政府工作繁多，責任重大；另一方面，又不能管死，以致窒息個人自由和創造力，剝奪民間智慧及批判反饋的空間。^③

學者們對於當代社會改革的實質，同樣做了比較性總結：所謂史達林主義模式，借用俄共總書記久加諾夫的說法，是“壟斷所有權，壟斷政治權力、壟斷真理”。這種以經濟、政治、文化三壟斷為基本特徵的史達林模式，同原來毛澤東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相對照，不是什麼“巨大進步”，而是嚴重的倒退。在經濟上，從適合於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各種所有制同時並存，倒退到公有制的絕對壟斷；在政治上，從各階級、各民主黨派的聯合政府，倒退為一個人說了算；在文化上，通過思想改造、批判《武訓傳》、《清宮秘史》，批判胡風、胡適，確立了輿論一律。總之是從建國初期的人民民主體制，倒退為經濟、政治、文化全面壟斷的體制。這個體制經過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四清等群眾運動而不斷鞏固，不斷加強，終於導致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從批判“兩個凡是”的表層開始，才對“三壟斷”的體制進行了實質性衝擊。^④

約翰伯格有一句話：“一個始終將自己置身於歷史的民族相比於一個經常與歷史割斷的民族，在行動和選擇上就要自由得多——這就是為什麼，這也是惟一的理由為什麼——所有過的藝術都是政治問題。”西方還有句話：我可以原諒，但我不忘記。我想，一切都只能建築在政治正確的這一合法性基礎之上。

^① 阿倫特：“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文化與公共性》，三聯書店，1998年，第97頁。

^② 資料引自張汝倫：“黑格爾和現代國家”，《自由主義批判與自由理論的重建》鬱建興著，學林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③ 林春：“承前啟後的中國模式”見《讀書》雜誌2006年第4期。

^④ 資料引自杜光：“改革的實質是突破壟斷”，見《炎黃春秋》2006年第3期

而這一總結又不禁叫人想起歷史學家胡繩的研究來。因為他的一個學術觀點曾引發起一個大問題，即國民黨究竟代表誰？

之所以馬上聯想到國民黨代表誰的問題，首先是因為我們在看中國近代史的時候，通常會習慣於套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這種分析的方法，要求為每一個政黨貼上階級的標籤。因為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那麼作為它的對立面的國民黨，理所當然應該代表資產階級。然而，胡繩先生卻告訴我們說，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原因，就在於它沒有搞資本主義，而“國民黨不搞資本主義，中間力量怎麼會跟它走？”

學者分析說“國民黨不搞資本主義”，那麼我們過去所瞭解的國民黨的階級性質就多少成了一個問題。國民黨代表誰的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要被提了出來。但胡繩先生在這個問題上卻並沒有改變傳統的說法。他依然強調：說“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政黨。這也不能說錯”，“國民黨總的說來是帶有資產階級傾向”。至於何以說帶有資產階級傾向的國民黨反而不搞資本主義，他的解釋是說：“籠統講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政黨，也不行。”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很複雜”，應該說，“國民黨代表著資產階級中不同層次的人，是個複雜的集團”。比如宋慶齡，至少宋子文、于右任、孫科、馮玉祥等，就多半“傾向民主主義，想走資本主義道路”，“資產階級的傾向本是比較多的”。問題是，“蔣介石為首的主流派，一九二七年後成為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是官僚資產階級”。

那麼，不是不說，因為國民黨的主流派是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或者乾脆就是官僚資產階級，它就不搞資本主義了？這大概也不是胡繩先生對問題的準確解答。因為在世界各國歷史當中，以大資本或官僚資本形式掌控政權，大行資本主義之道的例子有許多，說大資產階級或官僚資產階級就不搞資本主義，也不通。可以想像的是，胡繩先生生前想到了需要肯定資本主義對近代中國的進步意義，而他對由此所帶來的對傳統觀點的衝擊，卻尚未來得及做出更加周密的思考。因為我們在他時斷時續的談話當中，發現他實際上給我們留下了至少四種並不完全一致的解釋。

一是說蔣介石主觀上就不想搞資本主義，“說資本主義怎麼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蔣介石即使有過想搞資本主義的動作，也不過是為了拉攏中間派所做出的某些“姿態”而已。

一是說蔣介石主流派也不是一點不搞資本主義，問題是“他們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不敢真正反帝，和帝國主義有密切聯繫”。即“解決不了反帝、反封建兩大問題”，只能“在不觸動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範圍內搞資本主義，十年間（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引者）經濟雖有所增長，但資本主義並沒有發展起來，沒有為資本主義發展創造條件”。

一是說搞資本主義就要贊同民主，蔣介石政治上搞“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結果就搞成了法西斯獨裁”。本來抗戰時期“中共這邊毛主席已自覺提出中國應發展資本主義，蔣介石依靠的美國也有些人是支持中國搞資本主義的。可是就在這時候，蔣介石卻公開提出不但要反對共產黨，而且要反對民主主義。這樣他當然不可能去搞資本主義化”。

一是說國民黨在大陸搞不成資本主義的關鍵在於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因為按照胡繩先生說明的情況，其實蔣介石到臺灣後，也還只是“半獨立的地位”，照樣沒有實行民主，但他搞了土地改革，就成功地“發展了資本主義”，“走了上現代化道路”。

蔣介石確實有反資本主義的傾向和主張。這不僅有其《中國之命運》一書為證。而且也有蔣自“五四”時期至二十年代許多言論文字為證。但蔣介石為什麼會有反資本主義的傾向？這卻不是偶然的，是與當時條件下中國社會思想輿論環境有著密切關係的。

在近代中國，最早主張師法歐美的，就是康有為、梁啟超了。二人“百日維新”失敗，先後流亡到美洲與日本。但目睹了資本主義因貧富懸殊而造成的社會兩極分化與階級對立之後，他們卻極大地動搖了以往的想法，轉而開始對正在歐美日本如地火運行般的社會主義平等主張和理想，抱以了同情的態度。康有為隨後做《大同書》，梁啟超在日本疾呼“社會主義將磅於二十世紀也明矣”，就是他們思想出現變化的一個寫照。

同樣的情況，孫中山是以創建西方共和制度為目標開始其革命生涯的。但他在去了英國之後，思想上同樣出現了重要的轉變，開始公開表示同情社會主義。其以後關於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思想，以及三民主義以民生為終極目標的理念，都包含著強烈希望中國避免重蹈資本主義覆轍的願望。

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九〇三年激情澎湃地寫下了《革命軍》一書的留日學生鄭容，在日本兩年左右的時間，同樣受到了日本社會主義思想傳播的影響。其一九〇五年回到上海時，竟在法庭上公開宣告，他今後將以爭取社會主義為畢生之事業。

當然，歷史研究不反對“大膽假設”，問題是這種“假設”性的看法必須建立在“小心求證”的基礎上。也就是說，當我們準備提出某種看法和觀點，縱使是那些可能已經成為老生常談的觀點時，在今天都必須時時提醒自己，我們是否做到胡適先生所要求的：“拿證據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當共產黨人在一九二七年把蔣介石歸類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同時，一個美國學者卻用實實在在的證據告訴我們說，這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一九二七年建立南京政府之後，就與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而言，其實是相當緊

張的。

國民黨與資產階級的關係嚴格說來極為複雜，並非三言兩語和簡單化的一個結論就能說清。尤其是在國民黨成為執政黨之後，這種情況就更是複雜。在目睹了共產黨幾十年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艱難過程，瞭解到革命黨與執政黨大相逕庭的特性和使命之後，我們今天理應在談及國民黨的階級屬性的時候，表現得更加謹慎和客觀。因為直到1949年國民黨畢竟也曾經是一個有著二十多年執政歷史的執政黨。作為執政黨，無論它願意或不願意，它在相當多數的情況下都不可避免地需要站地國家利益和大多數國民利益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和制定政策（此即涉及到我們今天經常提到的“合法性”問題。^①

顯然，今天，我們注意胡繩的分析方法會遠遠重於他的任何具體結論的。因為他在研究、他在探索、他在創新。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說：“科學的目的不在於為無窮的智慧打開大門，而是在無窮的謬誤前面劃一條界線”。“科學的惟一目的，在於減輕人類生存的艱辛”。法國作家雨果說：“科學到了最後階段，便遇上了想像。”美國管理學家湯瑪斯·彼得斯說：“距離已經消失，要麼創新，要麼死亡”。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說：“創造是消滅死”。可以說，當今中外的思想家們概不如此，也許，正是在這些體驗的啟示下，我才能夠力圖去演進著自己的一點點看法。

其一，全部的不和諧因素都可以歸結為對社會主體——人的輕視；對人類環境——自然的踐踏。

其二，毫無疑問，一條中國現代化之路一定要顯示出民族特色與反映出歷史階段性來，我們強調“中國特色”，就是要說明它的民族性、地區性、國家性；我們指出“初級階段”，也就是要表示它的時代性、後進性和漸進性，沒有了這兩點，當然也就沒有了中國現代化每一個過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但是，無論這種特色“特”到什麼程度，也不管這種“發展階段”進入了哪一個時期，現代化道路一定有它的“本色”和“同質”。所謂“中國特色”，只能“特”在形式上，而不是“特”在內容上，只能“特”在發展道路上，而絕不是“特”在發展目標上。我們在說明“中國特色”時，更應強調創造性地吸收“人類文明一般”，而在確認“初級階段”時，更應強調體現時代性的“國際慣例”。

我們在理解“中國特色”的同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努力吸收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營養，不僅反映了我們的

^① 資料引自邱路：《國民黨代表誰》見《讀書》2002年第4期。（《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